

回憶冀淑英先生幾件事

李際寧

內容提要：本文作者主要是通過自己親身聽聞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古籍善本保護等工作細節描寫，感情真摯地記述了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專家冀淑英先生崇高而不平凡的生平事跡。

關鍵詞：冀淑英 古籍善本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予生也晚，不論年齡、入館時間還是學識，與冀淑英先生都隔著輩分。1984年11月我調進國家圖書館（當時稱北京圖書館）的時候，冀先生因編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這個項目，我們習慣地稱為“善本總目”，善本總目所在的辦公室，我們稱為“總目辦公室”），有一個時期不在館內，沒有見到。後來“總目辦公室”轉回本館，卻又因工作不在一起，與冀先生接觸、向她請教的機會不多，直到總目工作全部結束，纔有了比較多的接觸。雖然得到冀先生教誨的機會不多，大多又是零星片段，可是每每想起來，依然覺得對今天的工作和研究非常有意義。冀先生的學識和成就，學術界早有公認，自不用多說。古籍版本學界常用來評價某人學識的一句話，就是是否“懂書”。冀淑英先生不僅懂書，更愛書。她對中國古籍的理解，全面而深入。她也不僅僅是愛書，她熱愛的是祖國的文化。在此，祇就我自己與冀先生接觸中看到的、聽到的有關保護古籍的片斷，回憶記述如下。

八十年代中期，本館雖然對外稱“中國國家圖書館”，對內卻還沿用新中國成立以來使用的“北京圖書館”這個名稱，地址在文津街7號。因為是新來員工，大姐楊雪萍（後來調往其他單位）奉組長王玉良、王大可（後來也調出）的“命令”，先帶我到各組轉一圈。我理解，這是為了讓我盡快熟悉環境，也讓大家熟悉我。這似乎是善本組的傳統。通過她的介紹，我纔初步瞭解善本特藏部的基本組織情況。當時還沒有“古籍館”的名稱，與古籍相關的幾個專業組，如善本組、普通古籍組、金石拓片組、輿圖組、民語族、修整組，皆隸屬於“善本特藏部”。幾個專業組的辦公室分散在多處，比如普通古籍組、金石組、新善本（附屬於善本組）的辦公室在四號樓，金石組、新善本的辦公室內還附設有閱覽室；修整組在比鄰北海的北牆靠東邊一溜平房內；輿圖組設在一號樓東南方向的大房間內，輿圖閱覽室則在辦公室對面朝北的大房間，民族語文組與閱覽室在一號樓的西邊兩個房間內；善本組辦公室在一號樓北面半地下的幾間屋內，而閱覽室設在一號樓西北角的大房間內。善本、民語、輿圖的地下書庫都是相通的。現在回想起來，善本總目辦公室在哪裏，則一點印象也沒有。

大約在1985年初，善本組的辦公室搬到一號樓西南角的大房間，與民語組隔壁。

1985年下半年，善本總目辦公室從上海圖書館轉回，幾位先生也隨之回館，辦公室就設在民語組騰出來靠近善本辦公室旁不大的一個房間內，這使我第一次有緣見到了幾位先生，也第一次見到了冀先生。印象中，冀先生學者風範，說話不多，腰背已微微有點佝僂。

最後參與總目定稿的人員不多。據我的印象，當時祇有冀淑英、丁瑜、陳杏珍三位先生。九十年代初，南京圖書館的沈燮元先生也來到北京，協助冀先生定稿，直到總目編輯工作全部結束。總目辦公室回來後，我們就經常能在書庫見到冀先生了。平常，館內同事不論年長或年輕，都尊敬地稱呼她“冀大姐”，冀先生不論認識不認識，都微笑點頭致意。我們一輪小字輩，自覺稱呼冀先生為“大姐”未免太不夠資格，故改口稱“冀先生”，從此倒也“流行”開了。冀先生對善本書愛護有加，拿書的時候，總是平托著書，小心翼翼的，動作非常輕柔。給我深刻印象的是，她每次看過書後，都要把書仔細放好，再把一摞書整理一番，使上下齊整，左右適中。冀先生看過書的地方，永遠都是整整齊齊的，像沒有動過一樣。要知道，善本書特別是沒有裝函套的書，往往較軟，如果擺放不整齊，挪動中極易損壞。裝了函套的書，大小大小也不一樣，不放正，也容易破損壓壞，影響書的壽命和安全。冀先生對古籍的精心愛護，已經溶入她日常行為動作中。這種細緻的作風，無聲無形中給我上了重要一課。

善本總目辦公室搬回來了。大家幫助騰清房屋，擺放家具。總目辦公室因彙集了全國各地的目錄卡片，一大排目錄櫃幾乎佔去一面牆。另一面牆，我的印象是一排綠油漆的高層鐵質書架，放滿了包紮整齊的紙包和紙袋。辦公室的當中，幾個帶抽屜的辦公桌拼在一起，形成一個長方形的大桌子，就是幾位先生工作的地方了。聽陳杏珍先生介紹，那些紙包都是各地彙總來的資料，主要是信件、複印件等等，都是編輯總目時，向各館查詢版本的來往檔案。這些文件一包一包用舊報紙包裹，或用牛皮紙袋一摞一摞捆紮在一起，非常整齊。陳杏珍先生說，冀先生辦事非常認真，怕把資料搞亂，常常自己動手包裝捆紮。後來，善本特藏部從北海搬遷到白石橋新館的時候，所有善本書籍要求兩層包裝。這給了我們學習的機會，自己也就努力地學著把書包裹整齊。再後來，總目辦公室幾次調換房間，這些目錄櫃、資料袋都隨著搬動多次。我們也有機會看到一些資料。這些資料大多是書影複製件和答復總目詢問的來往信件。到白石橋新館後，善本總目的辦公地點也先後調整過多次，不管辦公室搬到哪裏，冀先生都要求工作人員將這些資料包裝捆紮好，擺放整齊。這些大包小包，幾乎成為善本總目的一道風景線。今日想起來，冀先生極力保護這些資料是有深意的。她是希望這些難得的資料能夠長期保存下去，為以後大家查考備案。正因為如此，善本總目工作結束後，一批重要的資料仍得以保存，未被散逸。其中，總目卡片目錄中的經、史、集三部，妥善地保存在國圖，子部保存在南京圖書館。其他調查資料、來往信件全部收藏在國圖。這份彙集了當年幾乎一代人心血的總目資料，成為中國善本總目工程的一份重要遺產。

冀先生對本館藏書有很深的感情。我本人就曾經多次聽她說過：咱們館的書太好了，不僅數量多，品種全，且成系統。各種版本的類型，差不多都能夠看到，這是別的館罕能相比的。她舉例說：“同一種書，別人也有，但是拿來與咱們館的一比較，版

本質量恐怕就差得遠了。”1982年，北京圖書館與全國一樣，剛剛擺脫“文革”動亂的干擾，工作開始逐步走向正軌，冀先生就在《圖書館學通訊》發表論文《源遠流長的館藏善本》，飽含深情地介紹建館歷史，歷數館藏善本書的源流。有一次，因為什麼事情談到本館的藏書，事情的起因已經記不清了，但是先生的一席話，令我至今不能忘記。冀先生深情地說：“我們館的善本特藏品太重要了，從甲骨、金文、拓片，到敦煌遺書、宋元善本，一直到當代名家手稿，比如魯迅、巴金等等，這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與文明的結晶。”先生的意思，是叮囑我們要保護好這些祖國的文化遺產。

冀先生對館藏善本歷史和源流如數家珍，而她關心古籍保護事業，對古籍修復技術也非常熟悉。在善本部流傳著這樣一則故事：冀先生剛剛來館的時候，趙萬里先生為了使她瞭解古籍修復的情況，特別讓她到修整組觀察老技工如何修復古籍。據說，趙先生要求她不用親手操作，祇要全部看在眼裏。哪些書原裝有什麼特點，為什麼這樣，要有說法。哪些書用什麼紙張修補，哪些裝具有什麼講究，要搞明白。



1989年7月20至22日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開會。左一為王世襄；右起為周紹良、冀淑英

大概得益於那個時期的訓練，冀先生對古籍的裝潢、木函書套的特點，瞭然於胸。五六十年代，國家古建修復，從大廟和老房子上撤換下來一批不能用的金絲楠木梁柁，經文化部、文物局特批，撥給北圖一些以做古籍裝具。北圖延請幾位能夠做細木活兒的老師傅，利用這些材料給一批亟待保護的珍貴善本加裝了楠木書盒。我們有時與冀先生一起看書，她常常會隨手拿起一個楠木盒，向我們分析評論這個木盒做工的好壞，例舉哪些地方做工細緻，哪些地方還應該有什麼改進。比如，楠木盒講究不松不緊，恰到好處，書在盒木中，既不使書籍被擠壓，又不讓書在木盒中晃蕩等等。後來一個時期本館曾經大規模地做書套，冀先生對這些書套的質量也很關心。冀先生曾對我說過，看書套做得是否合格，就看邊角切得是否整齊，折縫處的“擱角”是否達到合適角度，書套合上是否恰到好處。另外，從書套的“擱角”還可以大體知道做函套的材料是否較好，好的硬紙板，刀切下去，每個角度都是硬直的。紙板軟的，書套壽命短，看上去也不佳。聽冀先生的一席話，真勝讀十年書。

九十年代中，國家改革開放，經濟上有了很大發展，但在國圖經費使用上，常常短缺，而用到善本的保護經費方面，更是捉襟見肘。有時我們與冀先生說起來，她也很有感觸。一次說起經費的事情，她說：五、六十年代國家那樣困難，但是對搶救古籍和保護古籍還是盡力支持。香港著名藏書家陳清華欲轉讓珍貴善本，國家在經費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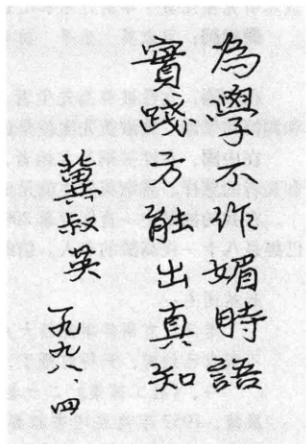
樣緊張的時期，由周恩來總理特批，斥巨資購回。那時期買東西要憑票證，北圖做書函套要用藍布，也要專項申請，國家特批布票。就是那樣困難的時期，國家仍然積極支持古籍的修復事業。凡北圖上報申請，國家從沒有短缺過。一次與冀先生談起善本書函套的選料，我問冀先生：“用藍布做書函套，是否有特殊的說法？”冀先生說：“有的藏書家特別喜愛某種書，用花綾彩錦作函套面料，不是不可以。但我們是國家圖書館，函套要做得樸素大氣。我們用的藍布，布紋樸素大方，顏色沉着莊重，最好。”她特別強調，善本書的修復不是簡單修舊補破，還要考慮是否樸素整潔、美觀大方。冀先生在這裏闡述的不是通常的審美觀點，而是如何理解保護古籍善本的原則問題。一次與冀先生看書，看到一種袁克文收藏過的書，書末下角略微殘破，有兩三字損去，袁克文用泥金補寫。我當時感慨地說：“看來袁克文挺喜愛這部書啊。”冀先生一笑，說：“那是公子哥的做派。”啊，真如醍醐灌頂！我似乎纔開始懂得什麼是古籍善本的審美。

1990年，為出版館藏敦煌遺書，需要將全部一萬六千餘號敦煌遺書拍攝膠卷。由於大量敦煌遺書殘破得非常嚴重，有的還變硬脆化，到了難以展開的程度，翻捲時稍不注意，極易損傷原件。如不修復，既影響讀者使用，也影響拍照質量。為探討如何修復敦煌遺書，方廣鎔老師特別召開一個座談會，邀請冀先生及古籍修復人員商討修復問題。冀先生當時提到了一個基本原則：“搶救為主，治病為輔。”她認為，部分敦煌遺書殘破非常嚴重，已經影響壽命，不修復，既無法工作，又容易造成新的破壞，這樣的經卷應該搶救。如果殘破並非很嚴重，不影響使用，也不會造成新的傷害，屬於可修可不修的，要慎重對待修整的問題。冀先生古籍修復的理念，繼承了趙萬里先生古籍修復的“整舊如舊”原則。2000年冀先生在《學林往事》著文《保護古籍 繼往開來——記著名版本目錄學家趙萬里先生》，特別提到趙萬里先生對古籍修復的理念，她說：“裝修工作固然主要是為古籍‘治病’，將那些因年久失修、以致脫綫、殘破、書口破裂、蟲蛀的書籍修補完整，得延壽命，趙先生更看重古籍的文物價值。如果沒有發現敦煌遺書，如果不是清代內閣大庫保存下來的眾多宋、元舊本，我們就看不到自唐、宋、元、明以來的卷軸裝、蝴蝶裝、包背裝、歷代書籍裝幀演變的實物。所以對裝修工作，趙先生強調古書非破敗，不得毀棄原裝，堅持整舊如舊原則。”“搶救為主，治病為輔”的原則，後來成為指導敦煌遺書修復的幾項重要原則的基礎。

冀先生退休前的幾年，我們感覺到，她有一種緊迫感，她常常利用各種機會，盡可能地講一講本館善本書的問題，她是希望在她退休之後，國家圖書館的善本事業後繼有人。1997年，我們希望冀先生就本館善本藏書的相關問題講一講，她一口答應，並作了充分準備。這次授課的錄音整理稿，後來收入《冀淑英文集》中，就是那篇《百川歸海 蔚為大觀》的長文。冀先生這個課程的內容，系統梳理了本館藏書的歷史源流，實際是冀先生在本館幾十年工作心得的總結。這個課程對在本館工作的人員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也是揭示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歷史的重要文獻。冀先生對這個館傾注了一生的心血，她對這個館的古籍善本有著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我們為寄存臺北善本書的事情請教冀先生。冀先生詳細地解答了有關問題。這批書在1964年以後，全部轉運到臺灣，後來由中央圖書館編輯出版了一部“國立北平圖書館寄存臺北中央圖

書館”的善本書目。冀先生找出這部“寄存書目”，有些動情地說：“真想看看這批書。”她又說：“在我有生之年，恐怕沒有機會去臺灣了，你們如果有機會，一定要去看看，那是咱們館的藏品。我們書庫中，還保存著那批書的裝箱目錄，那是我們的憑證，一定要保護好。那批書將來一定會回來的。”

冀先生退休前，是善本部職稱評審小組成員。一次，評審小組在議論寫論文與工作關係的時候，有同志認為圖書館應該以工作好壞為評判晉升職稱的標準，寫論文是自己的事，不應該與評職稱掛鉤。冀先生沉吟了一下，緩緩地說道：“我不同意為寫論文而寫論文。我認為，工作中遇到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題目，引導我們去弄明白，查考數據，弄明白了，就是論證過程。解決了，寫出來，介紹給大家，共同學習，有利於工作，就是一篇好的論文。這纔是寫論文的目的。”冀先生這樣說，也這樣做，她的成果都是從實踐中得來，又應用到工作中去解決實際問題。1998年中華書局編輯出版《學林春秋》，收錄的都是當代著名學者的自傳，並附學者照片和學者喜歡的格言或座右銘。當主編張世林先生為徵集自傳和拍攝照片來到冀先生辦公室的時候，據張世林自己講，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冀先生辦公室裏那一大排目錄櫃，冀先生是著名版本目錄學家，以目錄櫃為背景的照片，最能反映先生的工作性質。於是，就有了後來收進《學林春秋》中那幅照片。冀先生去世之後，善本部在介紹冀先生的生平簡介上，用的就是這幅照片，再後來，陳紅彥女士編輯《冀淑英文集》的時候，也特別選用了這張照片（見本輯第1頁）。《學林春秋》刊載的冀先生自擬的座右銘是：“為學不做媚時語，實踐方能出真知。”瞭解冀先生的人都說，這條座右銘寫得真好，就是冀先生一生的寫照。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善本組）